学术教育

"顾祠修禊"与"道咸以降之学新"
——十九世纪宣南士风与经世致用学风的兴起

魏 泉

[**摘要**] 清代道咸以降学风的转变，在学术史上已成为一种共识。除了传统的思想史角度外，对其具体发生的契机、转变轨迹和流衍空间的考察，也还可以从社会学的角度入手。本文以道咸年间京师宣南的文人交游为切入点，论证始于1843年，延续近三十年的"顾祠修禊"活动和道咸以降学风转变之间的关系，认为这一活动可以看作道咸学风转变的代表性事件。

[**关键词**] 顾祠修禊 道咸学风 宣南 经世之学 张穆 何绍基

[**中图分类号**] K24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03）01-0069-11

"Guci Xiuxi" and "the New Learning Since the Daoguang and Xianfeng Periods": the Social Attitude of Intellectuals in Xuannan in Beijing and Emergence of the Style of Study of State-craft in 19th Century

It is a commonplace of in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that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tyle of study took place from the Daoguang and Xianfeng Periods. Besides the traditional approach of history of thought, we can discuss the root cause and track of development his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angle of sociology. Taking the association of the intellectuals of Xuannan in Beijing as the point of entry,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ew learning from the Daoguang and Xianfeng Periods and "Guci Xiuxi" (the Gatherings at the Memorial Temple of Gu Yanwu), and believes that the latter is a representative phenomenon during the transformation.

一

修建祠堂，在中国是一种沿袭极久的习俗礼制。"朝廷建祠，则必取古之有大功德于天下者而祀之，所以奖忠臣示臣下也。都邑立祠，则不问其爵位之崇卑，勋劳之广狭，第以其有德于一方而祀之，所以报恩德志思慕也"。[①]道光二十三年（1843），京师士大夫在宣南倡建顾炎武祠，此后，每逢春秋佳日和顾炎武生日都在祠中举行祀事。这一士大夫自发的活动，前后延续了三十年，毫无疑问，"志思慕"应该是其主要用意所在。

作为开创了清初学术的一代学者，顾炎武的学术造诣和成就受到了同时代学者的推崇。[②]但是顾炎武身后，在乾嘉考据学兴盛的时代，顾炎武的学术影响，主要表现在音韵训诂方面，真正能体现其治学大旨和精髓的《日知录》和《天下郡国利病书》等，却未得到格外推重。最能代表乾嘉时期主流学者对顾炎武

[**收稿日期**] 2002-4-15
[**作者简介**] 魏泉（1968—），女，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北京 100871

学术成就和学术地位的评判的，是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一书。书中因强调汉宋分野，标举汉学正统，而置黄宗羲、顾炎武于卷末。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日知录提要》中，也是赞其“学有本原，博赡而能通贯”，“引据浩繁，而抵牾者少”，但对其经世之学，则称：“炎武生于明末，喜谈经世之务。激于时事，慨然以复古为志。其说或迂而难行，或愎而过锐。”“潘耒作是书序，乃盛称其经济，而以考据精详为末务，殆非笃论矣。”③正如《道光学术》一文所指出的：

亭林顾氏生当鼎革之际，抱明夷之思，深有感于明季学风之空疏庸腐，不能明气节以临大难，故首标为学之旨曰：行己有耻，博学于文。一以矫宋儒末流之弊，一以阐宋儒未尽之蕴。自时厥后，学者翕然向风，凡所谓名物训诂文字声音之学，流衍于乾嘉，家弦而户诵者，皆亭林所以矫宋儒末流之弊者也。然亭林所尤重者，在于敦励品节，以成致用之才，所谓经世之学，所以阐宋儒未尽之蕴者，独未见声气之应求焉。④

嘉庆年间，阮元任国史馆总纂，创设《儒林传》，并将顾炎武列为清学第一人。这是学术界对顾炎武在清代学术史上的地位的重新认识。此后，不断有学者私淑亭林经世之学，并对乾嘉考据学者忽略《日知录》经世之旨表示异议。⑤这种治学取向的转变渐渐成为一批学者的共识，并隐然蕴育出一种与乾嘉汉学异趣的新思潮。道光十四年（1834），黄汝诚辑《日知录集释》，也可以视为这种学界思潮的一个征兆。⑥至道光二十三年，张穆与何绍基在同人中倡修顾祠，岁举祀事，而且编纂《顾亭林先生年谱》。其对于顾炎武的评价，可以代表当时京师一批有为之士的共识：“本朝学业之盛，亭林先生实牖启之，而洞古今，明治要，学识该贯，卒亦无能及先生之大者。”⑦

不仅在清代学术史上对亭林之学的认识曾经有过如此的起伏，作为终身不仕清的明遗民，其“明夷之思”也使得在文网极严的康、雍、乾三朝，在京师为顾炎武建祠祭祀成为不可想象之事。嘉道之际，文网虽已日见松弛，但时值乾嘉汉学全盛之后，士大夫学者们所崇拜和祭祀的，还是东汉的经学家郑玄。嘉庆十九年（1814）和嘉庆二十四年（1819），在京的学者名流在京东隅万柳堂公祭郑玄，⑧就是一个显例。至道光初年，这种祭祀郑玄的活动仍见记载。⑨

一个与顾炎武有关的值得关注的事件发生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据记载，这一年“奉旨顾炎武准其入祀昆山乡贤祠。”⑩据称这份由礼部抄出、江苏巡抚会同江苏学政所上的奏疏，题请以顾炎武入祀乡贤祠的理由是：顾炎武“砥砺廉隅，匡扶名教”。而经部议拟准其入乡贤祠时，所下的评语则是：“已故江苏昆山县先儒顾炎武，植躬清峻，砥行端方，讲求经世之学。”不用说，这一评价代表了清朝官方对顾炎武的正式认可。而且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其对顾炎武讲求经世之学的强调。这对于当时趋向经世致用之学的一批京师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敏感的信号。此后（1843 年），这批京师学者在宣南倡建顾炎武祠，无疑也是因为官方已有了这不容忽视的先声。

修建顾祠的地点，选在在京师慈仁寺中西北隅的隙地。在这里修建顾炎武祠，最直接的原因是，康熙七年（1668）戊申春，顾炎武五十六岁那年到北京时，曾住在慈仁寺。⑪在这个直接的原因后面，更深层的因素则与宣南这一特殊人文空间的形成有关。

“宣南”是指宣武门以南，属于明清北京城的外城。清顺治五年（1648），清廷颁布谕旨，京师实行“满汉分城居住”，汉人一律迁居外城。明代后期北京内城“卿、寺、台、省诸郎曹在宣武门”，⑫而“入都之税驾，与出都之饯别，莫便于宣武门外”。⑬因其地利之便，加之颇具一些湖山之胜，林泉之美，明代就有一些官宦人家在此留下了别业、旧宅，加上周围多有古刹名寺可以供外地士子驻足，所以，当汉族官吏择居或建宅，外地进京士子尤其是南方人进京选择落脚点时，宣南很自然是大家的首选。久之，这里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汉族朝官、京官和士子为主要居民的相对独特的社会区域。从“士流题咏率署宣南”⑭来看，居住于此的士人们对这种独特之处也都有着一份清楚自觉的认同。

清代宣南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空间的形

成，有两个特别值得关注的因素。一个是慈仁寺和琉璃厂的书摊、书市的规模和功能；另一个是各省士子会馆的建置和功用。

慈仁寺位于广安门内大街，是千年古刹，始建于辽代。明代成化二年在原寺旧址上重建，名为“大慈仁寺”。清乾隆九年重修，改名为“大报国慈仁寺”，俗称报国寺。这里因地处宣南，是清代士大夫文人踪迹常至之处，其内大毗卢阁双松，是许多文人墨客吟咏的对象。施闰章、宋琬、王士祯、冯溥、田雯、宋荦、孔尚任、姜宸英、翁方纲等都有咏慈仁寺的诗作。不过，顾炎武之所以寓居于此，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这里有京师最大的书市。

顾炎武至京时，正值慈仁寺书市鼎盛时候。时顾炎武为撰写《日知录》，正遍访群书，寓居慈仁寺，对于不愿意以遗民身份住进身为清朝显宦的外甥徐乾学宅邸的顾炎武来说，应是最佳选择。同样，随着嘉道之际承平气象的消退，士大夫中有识之士对世乱将萌的前景忧惧渐增，为求“胜此时艰”，而讲求经世之学，并以建顾炎武祠来表达对顾炎武的追慕，倡导经世致用的学术旨归时，位于宣南的慈仁寺，就以其为士大夫流连题咏的传统和有亭林遗踪所在，而成为修建顾祠之地的理想选择。随后的修禊活动，能延续达三十年之久，也与其所处宣南的地理位置有很大关系。

会馆中士子会馆的发展则与明清两代的科举取士制度关系密切，因“京师为四方士民辐辏之地，凡公车北上与谒选者，皆建会馆以资憩息。”[15]以方便外地进京赶考的士子为目的的各省的士子会馆多建于宣南，经过乾嘉时期的快速发展之后，宣南一带会馆密集，甚至形成了一些有名的会馆街。这种状况客观上为各地到京应考的读书人提供了一个容易相互结识的环境。因三年一次的顺天乡试或会试以及恩科考试所出现的数年一次的全国应试士子汇聚宣南的盛况，是当时京师所独有的。

二

从嘉庆至道光初年的祭祀郑玄，到道光二十三年的修建顾祠，这一变化本身就折射出当时京师学者学术思想和治学取向的一种转变。

从道光二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首次公祭开始，至同治十二年（1873），三十年中，每年的春季（上巳日前后）、秋季（重九前后）和顾炎武生日（五月廿八日）都有祭祀活动，[16]共举祀事85次（其间包括三次特祭）。与祭者第一年有27人，此后每年都有新人加入，至同治十二年止，前后参与过祀事的京师士大夫共有286人（其中包括三名朝鲜使臣）[17]。人称“自道光甲辰以来，京朝仕宦之号称名士者，几无一不与此祭”。[18]在最初发起倡建顾祠的学者及参与修禊的同人身上，鲜明地体现出讲求实学，砥砺志行的新学风和新士风，故这些学者被后人称为当时的“朝士之秀”。“顾祠修禊”活动一经发起，即成相当规模，这反过来又为当时京师这种学术新风气的传播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场所，聚合了一个志同道合、往来密切的同人圈子。这个怀有共同的经世抱负和相近的学术旨趣的同人圈子的存在，以其规模所具有的效应，不但带动了一时风气的转变，而且保证了新学风的延续，使其不至于因一二人的存殁和离去而归于消歇和断绝。

在长达三十年的修禊活动中，自然会有人员的殂谢和更替，而且时代也在急剧的变迁中，不免会有同人间一些风气的转移和消长。

通过据《顾祠题名录》所编制的《“顾祠修禊”历次与祭人数统计表》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三十年间“顾祠修禊”的一些变化。

“顾祠修禊”历次与祭人数统计表

次序	时间	春祭	亭林生辰	秋祭	备 注
1	道光二十四年 1844	14	17	16	三月许瀚入都，特设一祭
2	道光二十五年 1845	8	26	21	
3	道光二十六年 1846	31	8	12	
4	道光二十七年 1847	35	22	29	吴[illegible]绘《顾祠秋禊图》
5	道光二十八年 1848	7	18	19	
6	道光二十九年 1849	17	32	15	亭林生日公饯何绍基，时奉命主广东乡试

续表

次序	时间	春祭	亭林生辰	秋祭	备 注
7	道光三十年 1850		18	19	十月十日特设一祭，以张穆配祀顾祠
8	咸丰元年 1851	18			
9	咸丰二年 1852	22			苗夔年七十
10	咸丰三年 1853			4	陈庆镛出都
11	咸丰四年 1854	5	7	8	
12	咸丰五年 1855	14	6	13	
13	咸丰六年 1856	31	15	18	司马钟绘《顾祠春禊图》
14	咸丰七年 1857	27	27	28	何绍基参与了生日和秋季的会祭
15	咸丰八年 1858	14	9	17	
16	咸丰九年 1859	15	12	19	秋祭并祭叶名澧
17	咸丰十年 1860	19	7		
18	咸丰十一年 1861	14	13		三月廿八日，朝鲜使臣求谒祠，特设一祭
19	同治元年 1862	10	10	8	
20	同治二年 1863	12	13	19	孔宪彝卒于此年，李慈铭与秋祭
21	同治三年 1864	18	10	9	秋祭，张之洞初次与祭
22	同治四年 1865	8	12	10	
23	同治五年 1866	10	11	17	祁寯藻此年去世
24	同治六年 1867	14	18	17	
25	同治七年 1868	13	17	16	秦炳文、王堃各绘《顾祠雅集图》
26	同治八年 1869	21	21	16	鲍康出都
27	同治九年 1870	15	10	14	
28	同治十年 1871	13	16	15	
29	同治十一年 1872	17	15	23	
30	同治十二年 1873	14	16	16	

从上表可以看出，顾祠修禊活动在三十年中有过两个高潮时期。一个是道光二十七年，此年新增与祭者 34 人，参与春祭的人数创下 35 人的最高记录，且有绘制《顾祠秋禊图》之举。这一高潮延续至道光二十九年，五月廿八日的公祭与祭者也有 32 人之多。另一个高潮是咸丰六年，这一年顾祠得到重新修葺，朱琦等人曾为文记之。此年新增与祭者 21 人，参与春祭人数达到 31 人。而且，“是日叶润臣、孔绣山两舍人并为展禊之会”，又属司马钟绘《顾祠春禊图》以纪其盛。

但是中间也有两个时期，祀事曾有中断之虞。一处是咸丰三年，时张穆已逝。何绍基丁忧回籍。苗夔年过七十，此后不见于题名录，有可能也去世了。这一年春祭和亭林生日祀事都未举行，秋祭与祭者也仅有陈庆镛、阮福、林昌彝、潘祖荫四人。而公祭后阮福将赴湖北，陈庆镛奉命回籍办团练，林昌彝因进呈《三礼通释》获钦赐教授，也要离京。咸丰四年，顾祠修禊事并未因主其事者的殂谢和离去而中断，不过与祭者的组成却也不能不有了很大改变。第二个祀事略感不继的时期是咸丰十年和十一年，这两年的秋祭都未能举行。此时最初与祭的同人几乎凋谢殆尽，而于咸丰年间主持祀事的朱琦、叶名澧、孔宪彝等也于此前此后先后过世。同治元年的春祭，迟至四月三日补行，参与人数也仅在十人左右。

根据上述盛衰的交替和人事的变迁，大致可以把“顾祠修禊”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前期从道光二十四年（1844）至咸丰三年（1853），中期从咸丰四年（1854）至咸丰二十一年（1861），后期从同治元年（1862）至同治十二年（1873）。这种分期首先是源于人员的代谢更替，但其中也包含着风气上的转变。

三

最初十年间，参与祀事者先后有一百多人。其中参与初祭的 27 人，也是修建顾祠的主要出资者。这些人中包括一批汉学出身的学

者（如徐松、张穆、何秋涛、何绍基、苗夔、郑复光、陈庆镛等）和谏垣之臣（其中陈庆镛、苏廷魁、朱琦以抗颜上疏弹劾权臣而直声震朝野，被人目为“谏垣三直”），也有古文名家（如梅曾亮、朱琦、王柏心、吴嘉宾、孔宪彝、邵懿辰等），有些人是一身而数任的。其中有不少属于此前程恩泽周围的学者圈。

当时的京师，固可称为“才士之薮”，“究朴学能文章者，辐辏鳞比，日至与闻”。但能“网罗六艺，贯穿百家，又巍然有声名位业，使天下士归之，如星戴斗，如水赴海”的学者，惟有阮元和程恩泽。[19]程恩泽比阮元晚出二十余年，而后人以为“以学术论”，其“博综”似过于阮元。特别是程恩泽“有过人之识”，“故其所交游揄扬，尤多魁奇隽异之士”[20]。这个圈子里的风气以融合汉宋、和而不同为尚。当时常州今文经学的代表学者刘逢禄和龚自珍、魏源都在其中，而以徐松为首的边疆史地学者和以理学崛起于湖湘的长沙经世致用集团，也都与程恩泽身边的学者圈子关系密切。其中，张穆和何绍基都是非常活跃的人物。

因此，在参与“顾祠修禊”的前期同人中所体现的，正是发源于程恩泽周围学者圈子中的学术新思潮，亦即王国维在《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中所说的“道咸以降，涂辙稍变。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务为前人所不为。虽承乾嘉专门之学，然亦逆睹世变，有国初诸老经世之志”。[21]顾祠之倡建并得到同人的附和，是以这种新的学术思潮为背景的。何绍基曾有诗追溯当时倡建顾祠的初衷：“我昔初构顾君祠，思将朴学萃俦侣。士人能读亭林书，皆得春秋拜堂庑。”可以想见，“群贤高会无虚岁，三祀虔将成盛举”，[22]这样一种郑重其事的祭祀活动，反过来也为提倡士大夫的“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砥砺志行，扩大经世致用思潮在京师以至全国的影响提供了重要的舆论空间。在何绍基作于咸丰二年（1852）的一首诗中，对“顾祠修禊”的影响和作用有清楚的表述：“亭林祠构今十年，海宇才杰争随肩。文词固勉根柢厚，风骨多有冰雪坚。”[23]

张穆（1805－1849），字石州，亦称石洲、石舟，山西平定人。与后来官至体仁阁大学士的祁寯藻[24]是姻亲。道光十一年（1831）九月，张穆以优行贡成钧。次年正月入都应朝考，得识同年生何绍基[25]和苗夔[26]。三人的友谊始于此时，终生不渝。

从张穆的京师交游中，不仅可以了解其经世致用之学的思想取向和治学环境，也可看出当时的旅京学者间常见的交往方式和特点。

道光十二年（1832）冬天在京师，张穆结识了俞正燮。[27]当时俞正燮馆于陈用光家，为其校《方舆纪要》。张穆“一再过之，颇多请益”。俞正燮欣赏张穆“慧而能虚，虚而能入”，“因与订交”。俞正燮比张穆年长三十岁，所以张穆“礼事之，尊为先生，不敢与齿也”。[28]

道光十三年（1833），张穆获交时官户部侍郎的程恩泽，并以“得汉学渊源”受其推许，而其为文更使程恩泽惊为“东京崔蔡之匹也”。[29]本来程、张两家已有三代之谊，故“情好之洽，久愈挚。不三五日必招过饮，投巾振袂，谈议交错。寒士之被礼者殆无与比”。[30]这一年张穆在京与许瀚[31]共同排次俞正燮的《癸巳类稿》十五卷付梓。

道光十五年冬，张穆初识郑复光于银湾客馆，“从之学算。围炉温酒，无夕或间”。郑复光还出自制远镜，和张穆相与窥月中黑点四散作浮萍状，又为其“说远镜之理。旁喻曲证，叠叠不竭。次日复手是书（即《镜镜诊痴》）见示”[32]。让张穆闻所未闻，大开眼界。

沈垚于道光十五年入都，馆于徐松家。从徐松处得闻“其地学之精”。第二年，在何绍基处结识张穆，并以自己的《长春真人西游记金山以东释》见示，“由是往来遂密”。[33]沈垚在写给王梓材的信里说：“垚于知名之士不敢妄与投契，而必求有真性情者乃与订交。数年来仅得平定张石洲一人，以此故耳”。[34]后来沈垚留京为桐城姚元之校《国史地理志》，寓内城。张穆“间旬出相访，则星伯先生为烹羊炊饼，招余（张穆）共食。剧谈西北边外地理以为笑乐”。[35]

道咸年间京师学者对边疆史地之学的研究，最初即发轫于亲历过边陲的祁韵士、徐松，并在徐松、张穆、沈垚以及其后的何秋涛

为核心的这个圈子中发展成型。当时治此学的还有理藩院程同文和龚自珍等人，程恩泽、俞正燮也有关于西北史地的考证著作。徐继畬、林则徐、魏源等人对于东南及海外舆地的关注，也是这一学术思路的延续。

道光十九年，张穆由淮安入都，应顺天乡试，因忤监者，“竟坐摒斥，不复得应试”。遭此科场之厄，张穆遂绝意仕进，“侨居宣武城南，闭户著书，益肆力于古”。[35]

道光二十年（1840）夏，俞正燮卒于金陵。冬沈垚卒于京师会馆。俞正燮、沈垚身后著作，皆赖张穆为整理校订以行世。

道光二十一、二年之交，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得京师这批讲求经世之学的士大夫学者对时局的忧患感更加深了一层。因此不难想象道光二十三年，当何绍基和张穆在京师倡议为提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清初大儒顾炎武立祠时，能得到同人的一致响应。而且从每次祀事都有新人加入的事实中，不难看出这种经世祈向对于不在此学者圈之内，但怀有经世报国之心的人，也都具有很大的感召力。

道光二十三年，张穆在集资修建顾祠的同时，还着手编纂《顾亭林先生年谱》。顾谱修成后，又以“国朝儒学，亭林之大，潜邱之精，皆无与伦比”，编纂了《阎潜邱先生年谱》。这两本年谱的修纂过程，也相当集中地体现了当时学者间前后相继，声气应求的风气。张穆《顾亭林先生年谱题词》对成书过程有详细交代[37]，何绍基《别顾先生祠》[38]诗也有“车徐谱岁月，张子重论撰。江南大河北，余韵蒐讨遍”句，从上述材料可看出，在修定《顾亭林先生年谱》的过程中，张穆参考了车守谦、吴应奎的本子，又多方搜集资料，且得到徐松、何绍基等人的通力帮助。

《阎潜邱先生年谱》的修纂也一样。据张穆的《阎潜邱先生年谱题词》可知，张穆编定潜邱年谱时，吸收了杭世骏、钱大昕的成果，又得到丁晏、叶名澧、刘传莹、何秋涛以及出资刊刻的祁嶲藻等人的通力协作，可见《阎潜邱先生年谱》的编定也非仅赖一人之力。

阎若璩与顾炎武不同的是，顾炎武抱明夷之思，终生不仕清。而阎若璩曾为雍正帝延至京师，索观所著书。阎若璩死后，雍正又亲制挽诗，复为文祭之。这也说明，当时学者所推重于顾炎武的，主要是其经世之志，致用之学，而非明夷之思。

道光二十四年，顾祠落成。同人初次公祭，与祭者 14 人[39]，张穆撰公祭文。此年张穆有《致陈颂南书》值得特别一提。这封信旨在规劝陈庆镛，而言辞之严厉直率，堪称少见。此信被收入《皇朝经世文续编》，陈庆镛年位远过张穆，当时已经五十岁，官至御史。张穆此信，“其言为平交所不堪”，李慈铭认为“固足见石州之亢直”。而陈庆镛以位高年长，而能“绝不以为忤，此岂今人所能及哉”[40]。据载，卒谥文节的吕贤基曾说：“为文不经石州呵斥订正未可示人。”以直声震天下的陈颂南“独俯首石州”，称“令斯人著獬豸冠，树立过吾辈远甚”[41]。道光朝士以志行相切劘的风尚，于此可见一斑。

当时学者中，尤其是治边疆史地的学者，于学术上的相质相商，前仆后继的风气十分感人，这也在张穆身上得到集中的体现。张穆生前，“以流通古籍，扬扢前贤自任。其于师友著述，表章尤不遗余力”。像俞正燮、沈垚等“皆同志之友”，张穆“钞其所著《癸巳存稿》和《落飒楼稿》藏箧中。及其人殂谢后，悉为谋诸有力者校刊传世”。程恩泽与张穆为“平生知己”，莫晋则为其“婚姻尊行”，二人都是“宾客盈门”的胜流显宦，而“身没以后，诗文奏议零落殆尽”，张穆“百计搜罗，付之剞劂。其笃于风义如此”。[42]陈康祺《郎潜二笔》称：“比年厂肆旧书遇有石州手校之本，靡不精审，康祺心窃向之。”[43]

但是张穆自己的著述却大多未及在生前刊行，而是身后“赖友朋弟子掎摭成编”。其《蒙古游牧记》后四卷由何秋涛续成；《㕊斋文集》则由何绍基委托张穆弟子，张、何二人的好友冯志沂的外甥吴氏兄弟编录而成。二书皆由祁嶲藻为之出资刊行。这既有何秋涛所说的“特具识鉴，取友必端。报施之理，良非偶然”[44]，也正足以代表当时京师学者同人间的肝胆相照，合作无间。这种风气在治东南海上边疆史地的学者中也同样存在。

梁启超在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曾指出，“道光中叶以后，地理学之趋向一变，

其重心盖由古而趋今，由内而趋外”。并举其时以边疆史地之学名其家者，为“寿阳祁鹤皋（韵士）、大兴徐星伯（松）、平定张石洲（穆）、邵阳魏默深（源）、光泽何愿船（秋涛）为最著。而仁和龚定庵（自珍）、黟县俞理初（正燮）、乌程沈子（垚）、固始蒋子潇（湘南）等，其疏附先后者也。此数君者，时代略衔接，相为师友，而流风所被，继声颇多。兹学遂成道光间显学。”[45]所强调的，也是当时京师的师友交往与风气转变之间的内在关系。顾祠修禊的核心参与者中，张穆、何绍基、苗夔三人是辛卯同年优贡生。以次年（1832）至都应朝考，得以订交。苗夔说：“同年咸集，独与何子贞、张石洲以说经讲小学最相得。嗣后或聚或散，然聚之时较多。”[46]何绍基对此的解释是：“此三人者志相合，学相砥，闲冷野逸，性相似也。”[47]三人中只有何绍基成进士，为翰林，张、苗二人则困踬科场。但三人“或居或游，踪迹恒聚于京师，素心樽酒，稽经诹史，过从罔间”，前后长达十八、九年。说到三人的性情，何绍基称：“余交游最广；石州狷，次之；先麓狷甚，又次之”。除了性格方面的原因外，交游的广狭大约也与际遇的穷达有关。何绍基为当时的户部尚书何凌汉之子，又“成进士，入翰林”，而另两人则困于科场，甚且绝意仕进。不过，在取友原则上，三人应有共同处，所以何绍基说：“两君所善者，则无不与余善。”[48]对于顾炎武之学，苗夔有言：“余之学私淑亭林，子贞、石州则读亭林之书而仰止行止者也。”[49]

应该说，何绍基个人的交游圈子在“顾祠修禊”的发起和延续上，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张穆性情狂狷，和与自己学术兴趣相同的人往来密切，生死相托，但对当时以古文名于京师的梅曾亮等古文家则不能免于门户之见。[50]

梅曾亮本人参与过两次顾祠修禊，而顾祠创建之初的与祭者中，也颇有师事梅曾亮，从之问古文义法的古文名家，像朱琦、冯志沂、吴嘉宾、邵懿辰等，这批人之所以会成为顾祠修禊的同人，跟何绍基的关系比较密切。何绍基所交远不限于汉学中人，所谓“平生友朋乐，妙集当时英。冠盖寻冷交，琴尊栖古情。词林多矫矫，谏院尤觥觥。下僚经世怀，高士著书声。凡我所不足，诸君分其赢”。[51]而且何绍基本人在当时谈诗论文也相当有名气。[52]

此外作为湖南人，何绍基与京师以唐鉴为首的讲理学重躬行的湖湘士大夫集团也多有交往，其中与曾国藩的关系就很值得关注。

道光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五日的顾祠初祭后，三月曾因许瀚以公车人都，同人在顾祠特设一祭。此祭以亡故的老友俞正燮、陈潮、沈垚、张际亮的灵位配祀，这样做不仅是因为他们是张穆、何绍基等人的好友，主要还是因为他们的学问、志行、风范，体现了顾炎武博学于文、经世致用的大旨。

五月，未及参加顾炎武生日的公祭，何绍基即因典试贵州出都。临行前他特地到顾祠瞻拜，并以诗言志：“持衡恩命被，万里指罗甸。登程复过祠，仰止有余眷。”从精神上对于“先生冠儒林，狂澜植厓堰”的“仰止”，到以“君亲鉴吾身，学行须贯穿。愿从实践入，敢恃虚谈便”的“行止”自期，明确表示要“且当语黔士，庶弗规为瑧”。[53]

道光三十年，何绍基丁母忧回籍。咸丰二年（1852）壬子三月服阕。七月何绍基回到北京，受到登基不久的咸丰帝的青睐，被简放四川学政。[54]对于怀抱经世之志的何绍基来说，这真是大有作为的机会。

九月顾祠秋祭日，苗夔等公饯何绍基于顾祠，何绍基作诗留别诸友人，以“时事艰难各努力”相期相勉。[55]

开始，在其恭报到任折和奏报考试情形折上，咸丰帝还朱批：“地方一切情形，随时访查具奏”和“汝能如是认真，朕甚嘉悦”。嗣后何绍基出省按试，有关系吏治民生及军国要务的事，都随时上闻。

咸丰四年夏秋间，何绍基“以南江县郑怀江冤狱及大吏需索陋规、河东土司安安氏安平康母子争袭各案，先后驰奏”。虽然钦差大臣前来查办，悉如所议平反办结，但也因此致为权贵侧目。咸丰五年（1855）五月廿四日，何绍基科试潼川完竣回省，才得知自己“于四月内因缕陈时务十二事”，被皇上责以“肆意妄言”，由部议以私罪降调。[56]

像道光十九年张穆应顺天乡试被黜一样，咸丰五年这次被降调也是何绍基一生的转折

点。此后他绝意仕进，寄情山水。在游历名山大川之后，接受主讲山东泺源书院和长沙城南书院之聘，主持书院讲学十余年，对学生“勗以实学”[57]。这也代表当时读书人仕途进退的常态。进则以其所学用世，退则以其所学传授生徒。

四

因首批参与顾祠修禊的同人或去世或离京，至咸丰三年有过一次人员上的更替，对此何绍基和苗夔都有记述。苗夔的《使黔草序》中提到：“岁癸卯，子贞集同人鸠赀创建亭林顾先生祠于城西慈仁寺西隅隙地，每岁春秋及先生生日皆举祀事。尝有《春禊》、《秋禊》二图，同人多赋诗纪事。迄今计之，前此与祭者，汤海秋、徐星翁已逝，苏赓堂、陈颂南、许印林、王朡轩、冯敬亭、赵伯厚、朱伯韩、郑浣香、叶东翁、王子怀、杨墨林、子言兄弟皆先后归里，罗椒生、朱亮甫、庄卫生、魏默深俱外擢。后至者，来往无定，惟余与石州、子贞，则每举咸在。”[58]此时张穆还在，应该是说的道光二十九年底之前的情形。

何绍基的诗中也有“徐（星伯）张（石州）继逝苏（赓堂）陈（颂南）归，小子孑焉坛坫主。后来吕（鹤田）叶（润臣）冯（鲁川）何（秋涛）边（袖石），不坠风流肃樽俎”[59]的句子。这首诗作于咸丰七年，但所说的是咸丰初年、咸丰二年间的事情。有材料显示，自咸丰六年重修后，顾祠在很大程度上从一个祭奠场所变为一个宴集社交的场所。参予禊集的同人，也从最初的以汉学家特别是边疆史地学者为主，转变为以诗人、文人尤其是宗奉八家文的古文家为主。不变的是其中仍有不少谏垣之臣。

中期的“顾祠修禊”，中心人物有朱琦、王拯、孔宪彝、陶樑、张祥河、祁寯藻、叶名澧等。被降归后，何绍基一度足迹罕至京师，提到京中“顾祠修禊”，有诗云：“传闻古寺就颓落，想到双松成怆楚。比来欣展王郎札，饰荒得自孔君语。”也是知道顾祠修禊之事几辍而复举，但“固然修坠事足欣，未免回思意增怃。人事无常有兴废，圣业不朽贯今古。读书所贵才识兼，不在词章绚玑组。”[60]此时的何绍基久不在京师，已经不再在顾祠修禊中扮演核心角色。不过，京中主持顾祠修禊的仍都是他的好友，何况他此时已经绝意仕进，又本乐耽诗酒。可以说，前期和中期的顾祠修禊中，风气的改变在何绍基身上有一个过渡。

咸丰六年（1856），重修了顾祠，朱琦、王拯有文记之。[61]咸丰七年，何绍基一度入都，重与禊事，应该说亲眼目睹了这种变化。从何绍基《东州草堂诗钞》中的一组作于咸丰七年（1857）的诗作的题目上，也不难想见，此一时期宣南士人在顾祠聚会之频繁。[62]

咸丰十一年（1861），何绍基有《忆顾祠》诗，诗前小序有云：“近年京师吟社，多在顾祠、长椿寺、松筠庵、寿阳第”。从“吟社”一词，可以体会到顾祠修禊同人的某种转变，即由励学谈史转为诗酒唱和。

不过这一时期的同人中，砥砺志行之风仍然浓厚。以咸丰五年（1855）初次与祭的尹耕云为例，尹是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祁寯藻视学江苏时即“重其学行”。尹耕云于“咸丰中官御史。时方多故，封章数上，人争传诵，直声著一时”[63]。这是指咸丰八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的舰艇驶至直沽，当时尹耕云“剀陈时政，疏凡八九上。最后以与设立夷馆议，力争不可，痛哭于朝”[64]。

徐鼒《敝帚斋主人年谱补》中咸丰八年条记有：“三月望至都，四月夷船驶入杨邨，官军奉议款密旨，莫敢进击。廷臣争者数十人，王侍郎茂荫、殷学士兆镛、尹御史耕云，言尤痛切。”[65]此处提到的其他两人也都是顾祠修禊与祭同人。可见此时顾祠修禊与祭者中，谏臣风采犹在。

后期（1862－1873）的“顾祠修禊”，与前期相比，虽然仍在按期举行，但基本上流于一种形式。与祭者中，既少前期经史学者“承乾嘉余绪”而复“为前人所不为”之学的学术上的开拓，又无中期那批既有经世之才，复以能诗能文名于世者的文采风流。难怪不止一个此期参与过顾祠修禊的人，对此发出老成凋谢，不复昔时之盛的感慨。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李慈铭和孙衣言的记述。

李慈铭于咸丰九年（1859）入都，浮沉郎

署。同治二年（1863），他曾参加过顾祠秋祭，但是在日记中却未提及。后来在记其想为郑玄作生日而无钱无客时，才牵连提到：

忆道光初，胡竹邨氏曾举是祭，所招有龚定庵、夏心伯，而《定庵集》中有诗纪事，乃痛砭郑君之学，心伯著《庭闻录》深诋同集之人，叫讙祼袒。夫以胡氏经学名家，又尔时承乾嘉之后，海宇晏清，人才尚盛，而召客已不能尽择。盖同方同术，自古为难，何论今日耶？即如都中近日顾祠大会，大率不识一字之朝贵及翕热奔走之少年，其胸中尚不知《日知录》为何书，而俨然衣冠，春秋奠醊，奴颜婢膝，尘汙粪言。吾知亭林炎灵遁逃之不暇矣。礼堂孤学，服膺毕生，束带陈经，粪墙可见，奚必修市脯之敬，尽村酤之酧乎？[66]

和李慈铭一样，孙衣言也只参与过一次同治七年顾炎武生日的顾祠修禊，并负责题名于册。在记完与祭者名单之后，孙衣言又抚今追昔，抒发了一通感慨：

始顾先生祠初成，余实在京师。予友孔绣山、叶润臣、朱伯韩屡要予一拜先生，予未敢往也……今年春以选人至京师，则文端公下世已二年，王侍郎、蒋府丞亦先后亡，工部官秦中，户部归桂林。适逢先生之生辰，得从诸君子后以祭先生。既卒事，同年鲍侍读子年以故事出先生画像卷，命为题名。展卷读之，则文端公及旧游诸君子之遗墨多在，而二十年题名卷中类多文章卓荦之士，衣言亦往往得见之，何其盛也…… 今国家多事，虽不能如二十年前之易于有为，然自顾祠之初成，道光癸卯、甲辰之间，世事之变固已萌 其间矣。使上之人怵惕惟厉，以求贤才、修政事为心；下之人发愤为雄，以崇廉耻、知古今为务，至二三十年而谓中国之聪明材力必不足以得志于天下，谁其信之？[67]

孙衣言最后写下的一句话分量很重，其曰："衣言幸得从二三子拜先生之祠，瞻仰先生之遗貌，其当思所以无愧于先生，岂徒以为相从饮酒，修饰故事而已哉?"[68]

同样，李慈铭的话虽然不无过激之处，也仍然可以“觇世运升降，学术隆污”，故“非一人之私言也"[69]。而且“同方同术，自古为难”，也从反面证明，初期的“顾祠修禊”同人中，敦品力学风气之可贵，不仅在学术上有相当的研究，于学风方面也有无形的转移。

同治年间京师人才空虚也许还有另一个原因，即自从曾、李所率的湘军、淮军在与太平天国的对抗中兴起，曾国藩、李鸿章相继开幕府纳士，一时人才云集于幕府，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特别是曾国藩幕府中，“宾僚尤极一时之盛”[70]，“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全国之人才精华，汇集于此。”[71]

同治十三年以后，“慈仁寺日就荒圮，顾祠亦渐颓废。祭仪断续无常，莫可究诘。”[72]延续了三十年的顾祠修禊至此进入了尾声。

不过，此事还有袅袅不绝的一缕余音。据雷梦水文中称，民国七、八年间（1918－1919），吴县张仲仁（一麐）等倡议葺复顾祠，到1922年重修正殿竣工，当时张仲仁已经离京，由吴昌绶约同孙雄、陆鸿仪等设祭，顾祠遂复旧观。[73]关于此事的另一个说法是，“己未（1919）春，庄思缄、罗秋耘诸君修原祠，复祭于慈仁寺"[74]。不管哪种说法更为准确，至少可以知道，1920年前后，的确有人曾经尝试恢复“顾祠修禊”这一宣南士大夫的传统。

王国维关于清代学术“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的经典表述，着眼于学术的承继和时势的转移及二者的关系。所谓“道咸以降之学新”，既指出其“承乾嘉专门之学”，又强调由于时势所迫，学者“逆睹世变”，遂“有国初诸老经世之志"。后世史家对于此一时期学术风气的描述，基本上不出这一思路。尽管对于道咸以降学风转变的具体指陈略有异同，[75]但从整体而言，“道咸以降之学新”的说法殆可谓于学术思想史上已成定论。其所谓“新”者，概言之，是经世致用学风的兴起。

学术的积累和学风的转变，都非一人之力可以达成。一代学风的转变，固与其特殊的时代背景有关，且得力于这个时代杰出之士的倡

导和推动。但在这时代和个人两极之间，还有一层会影响到风气转变的不应忽视的重要因素，即士林交游。也就是仕宦、学者、文人之间，借由种种关系（如亲属关系、同乡关系、师生关系、同科同门关系）和方式（如学术交往、诗文唱和）结成的小圈子。这些小圈子对于大风气的形成之所以能产生重要影响，是基于以下原因：

首先，一个时代的杰出之士不可能脱离其生活于其中的特定环境而一无依傍地形成他影响到整个时代风气的思想。事实上，他与师友之间因交往而产生互动，其影响总是双向度的。

其次，在报刊等大众传媒尚未进入大众生活并产生广泛影响的十九世纪上半叶，仕宦学者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主要是在声气相投，志同道合的师友之间进行的。受传播渠道、地域及流布方式的限制，在某一小圈子中更易于形成相近的学术取向。而且，以一时一地之风气的形成而言，一个士大夫小圈子作为群体所发出的声音，自然要比“孤吟无和”的个人的声音更响亮。

再次，清中叶以后，学界和官场中的士大夫官僚间的交往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模式，此即费正清所说的“庇护制网络”㉕。这种模式的形成源于读书人发展其周围私人关系的惯例，首先是其与读书时师从的老师、科举考试中的座师和延聘其入幕或主讲书院的恩主之间的私人关系；其次是与同科士子、同学及同一思想流派的人建立密切的私人关系；另外传统的社会关系如亲属关系和同乡关系也在其身处异乡时发挥着重要作用。

京师作为四方辐辏、人文荟萃之区，在清代的学术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道咸年间经世致用学风的形成，就与宣南特有的人文背景有关。其中，揭帜于常州的今文经学和崛起于湖湘的理学传统，都是经由旅京学者（绝大多数居于宣南）在京师的学术交流而发生了广泛的影响。边疆史地研究成为引人瞩目的显学，更是扎根于宣南深厚的学术土壤之中。可以说，道咸以降学风的转变，得益于宣南士人与来京的外地学者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在由不同学者仕宦组成的小圈子里生发出来。倡建顾祠的张穆和何绍基，都是道咸学风转变中具有代表性的重要人物，而“顾祠修禊”，正可看作是道咸以降学风转变的代表性事件。

---

① 王筠《清诒堂文集》（屈万里、郑时辑校）13页，齐鲁书社1987年版。

② 见潘耒《日知录序》，《日知录集释》卷首，同治八年刊本。

③ 纪昀《日知录提要》，见《日知录集释》卷首。

④楚金《道光学术》一文，见《中和月刊》二卷一期，此处引自沈云龙辑《中和月刊史料选集》260页，《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六十辑，台湾文海出版社。

⑤ 参见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五。

⑥ 参见《日知录集释序》，《日知录集释》卷首。

⑦ 张穆《亭林年谱题词》，《㞐斋文集》卷三，“山右丛书”之《㞐斋集》，山西省文献委员会印。

⑧见《清史列传》卷73《徐璈传》和陈奂《师友渊源记》。另外关于此事的记载还见于胡培翚《研六室文钞》卷八的《汉北海郑公生日祀于万柳堂记》附记。

⑨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转引自罗继祖《枫窗三录》423页，大连出版社2000年版。

⑩ 张穆编《顾亭林先生年谱》86页，《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第七辑，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4月版。

⑪张穆编《顾亭林先生年谱》52页。

⑫史玄《旧京遗事》第5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⑬天启四年《广州会馆记》，转引自岳升阳著《北京城市历史地理》529页，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5月版。

⑭夏仁虎《旧京琐记》卷八《城厢》，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⑮见嘉庆二年（1797）《新置宇县穜稑行六字号公局碑》。

⑯其间曾有数次未能举行，如道光三十年的春祭、咸丰元年的生日和秋祭、咸丰二年的生日、咸丰三年的春祭和生日、咸丰十年的秋祭、咸丰十一年的秋祭。

⑰此数字据《顾先生祠会祭题名第一卷子》所载统计，该册为光绪己亥（1899）七月重装，1918年由方还影印刊行。

⑱雷梦水《慈仁寺集市》，见《北京文史资料精华·府园名址》329页，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

⑲见何绍基《龙泉寺检书图记》，《何绍基诗文集》784页，岳麓书社1992年版。

⑳楚金《道光学术》，《中和月刊》二卷一期。

㉑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王国维文集》475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

㉒何绍基《题王子梅顾祠听雨图》，《东洲草堂诗钞》卷十八。同治六年刻本。

㉓何绍基《东洲草堂诗钞》卷十四。

㉔祁寯藻，字叔颖，山西寿阳人。嘉庆甲戌进士，选庶吉士，官至体仁阁大学士。谥文端。著有《曼九亭诗集》、《马首农言》、《勤学斋笔记》等。

㉕何绍基(1799－1873)，字子贞，号东洲，晚号蝯叟。湖南道州人。户部尚书何凌汉长子。道光十六年进士，官至国史馆提调，四川学政。

㉖苗夔，字仙麓，肃宁人，优贡生，著《说文声读表》等书。

㉗俞正燮(1775－1840)，字理初，安徽黟县人，著有《癸巳类稿》、《癸巳存稿》、《海国纪闻》等。

㉘张穆《癸巳存稿序》，《㞐斋文集》卷三。

㉙㊱见祁寯藻《㞐斋文集序》。

㉚见张穆《程侍郎遗集初编序》，《㞐斋文集》卷三。

㉛许瀚，字印林，山东日照人。举人，官滕县训导。也是治《说文》的小学家。

㉜张穆《镜镜冷痴题词》，《㞐斋文集》卷三。

㉝㉟张穆《落飒楼文稿序》，《㞐斋文集》卷三。

㉞沈垚《与王朦轩书》，《落飒楼文稿》。

㊲见《㞐斋文集》卷三。

㊳见《东洲草堂诗钞》卷九。

㊴这 14 人是：苗夔、陈庆镛、何绍基、苏廷魁、汤鹏、朱琦、罗惇衍、庄受祺、冯桂芬、赵振祚、张穆、冯志沂、潘曾玮、杨尚志。其中张、何、苗三同年，“谏垣三直”俱在，汤鹏少年及第，二十余岁即授礼部主事，当世目为异才。也是御史出身，意气踔厉，勇于言事。罗惇衍和其后参与顾祠修禊的乔松年都是 1835 年汤鹏任会试同考官时所拔擢的少年士子。赵振祚是张穆的妻舅。

㊵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1167 页，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 年版。

㊶祁寯藻《斋文集序》。

㊷㊹何秋涛《㞐斋文集序》。

㊸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五，《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407 页，中华书局，1984 年版。

㊺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388 页，东方出版社，1996 年版。

㊻㊾(58)苗夔《使黔草序》，《何绍基诗文集》1083 页。

㊼㊽何绍基《村谷论心图记》，《何绍基诗文集》789 页。

㊿志沂与张穆是同乡好友，当时梅曾亮在京师“以古文词提倡后学，一时京朝官如诸暨余小坡、桂林朱伯韩、新城陈懿叔、马平王定甫时时载酒从先生游”。冯志沂“亦厕其末，执后进礼”。梅曾亮不喜汉学，张穆也不喜八家文。梅曾亮听说冯志沂“交石州”，“默默不置可否”，而张穆闻冯志沂从梅曾亮治古文，“辄不乐，或怒加诮让”。不过，冯志沂本人还是“往来于两家者如故”。冯志沂《授经台记》，《影山草堂杂文》，《丛书集成三编》五十九册，第 155 页。

(51)1844 年，顾祠初祭后，何绍基奉命典试贵州，作《出都四首》，此其四，《东洲草堂诗钞》卷九。

(52)《曾国藩日记》道光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记作诗文称“何子贞、汤海秋二君最为敏捷”。曾、何二人在京的交往也以谈诗最为默契。

(53)何绍基《别顾先生祠》，《东洲草堂诗钞》卷九。

(54)(56)见何绍基《去蜀入秦纪事书怀》诗序，《何绍基诗文集》356－357 页。

(55)何绍基，《东洲草堂诗钞》卷十四。

(57)熊少牧《何绍基墓志铭》，见《东洲草堂文钞》卷末。

(59)(60)何绍基《题王子梅顾祠听雨图》，《东洲草堂诗钞》卷十八。

(61)朱琦自己也说写了《顾先生祠记》，但不见于《怡志堂文初编》，不过该集收有一篇《昆山顾亭林先生祠记书后》，其中说，咸丰二年，韩介孙教谕昆山，在玉山讲院旁建了一个顾炎武祠，并为之记。朱琦认为“前后数年间，南北若合符契，朴学兹盛矣。”(文见《怡志堂文初编》卷六)王拯的祠记也不见于《龙壁山房文集》。

(62)《丁巳(1857)杪春，朱伯韩、孔绣山、王少鹤、叶润臣觞我于顾祠，宾主共十人。客有符南樵、林颖叔(寿图)、刘炯甫、宗涤楼(稷辰)、朱眉君》、《清明之后，朱伯韩、孔 山、王少鹤、叶润臣招集顾祠，即题润臣＜城南买醉图＞后》、《闰五月，王子梅至京，以廿八日宴客于顾祠，正值亭林闰生日，有诗作。并且是日寿阳相国(祁寯藻)、诗舲少宰(张祥河)皆有和作》。《八月，范云吉比部招同朱伯韩、王少鹤、李眉生、赵元鹳、李六榕、朱眉君宴集顾祠》。

(63)高延第《心白日斋集序》，《心白日斋集》4 页，“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四十二辑。

(64)吴昆田《河陕汝道尹君墓表》，《心白日斋集》5 页。

(65)徐鼒《敝帚斋主人年谱补》86 页，“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二十七辑。

(66)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转引自罗继祖《枫窗三录》423 页，大连出版社 2000 年版。

(67)(68)见于《顾先生祠会祭题名第一卷子》。

(69)罗继祖《慈仁＜顾祠题名录＞》，《枫窗三录》424 页。

(70)薛福成《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庸庵文编》卷四。

(71)容闳《西学东渐记》，87 页。

(72)(73)雷梦水《慈仁寺集市》，见《北京文史资料精华·府园名址》328 页。

(74)见于《顾先生祠会祭题名第一卷子》卷首的方还识语。

(75)参见楚金《道光学术》，《中和月刊》二卷一期。

(76)参见费正清所撰《剑桥中国晚清史》的第一章：《导言：旧秩序》，《剑桥中国晚清史》19－20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